

父亲的答卷

□靳洪卫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8

2026.6.17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那年,端午

□张梅

十点多,你推着三轮车出门回来时,车把上挂着明晃晃的太阳

你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几只粽子
“红枣的,豆沙的,肉的”
就那么捧着
笑着,看着我

如今,端午的粽子堆满冰箱
可再也没有一只
是带着体温递到我手上

姥爷,九年了
你走之后
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粽子
也再找不到
有你的那个端午了

心·事

□道缘

在岁月的长河中嘶吼
断断续续
有气无力
在快乐与忧伤的夹缝里
诉说着年轮的流逝

一颗无法平静的心
不敢大笑欢喜
怕仅存优美的羽翼片片离去
不敢大声哭泣
怕引来羸弱的灵魂
跟着一起破碎离场

迷茫而又坚定
那就对着旷野
大声喊叫吧
只为了
准备飞走的心

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都在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。每每想到这里,我就会联想起自己的父亲。他为人真诚、做事认真、不骄不躁,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人生的美丽答卷。

父亲靳树常,1928年生,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一名老党员。父亲能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投身革命,与他早年接受先进思想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说起来,这应归功于我的爷爷。为了能让父亲和叔叔上学识字,爷爷抛家舍业一个人从山东去了东北,在那里出苦力做劳工,挣了钱就寄回家里,父亲才有机会上了几年私塾。因为有了文化,认准了革命的意义,后经地下党介绍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组织上看到父亲有文化,字也写得好,将他分配到原中共渤海区党委工作,两年后又到新设立的惠民地委(现滨州市委)工作,先后担任通讯员、秘书、档案员。父亲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。做档案工作时,由于精心研究业务,整理的资料规范、标准,还将经验撰文刊发于《档案工作》,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。

1959年6月,父亲作为淄博专区(与惠民地区合并)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。会上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。父亲说,本来毛主席那天也是准备接见与会代表的,后来因临时会见外宾不能来了。未能见到毛主席,成为父亲一生的憾事。这次会议之后,父亲把周总理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,全身心地扑在档案事业上。那时,档案局的人手少,除要完成本局的工作任务外,还负责全区12个县及地直各部门档案的业务指导,工作量特别大,加班加点是寻常事,在家里很少能见到父亲。父亲的敬业精神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。1965年,父亲被任命为惠民地区(现滨州市)档案局副局长。组织上的信任,是对父亲莫大的鼓舞,他始终牢记党的教导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。

几十年来,父亲坚持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,做到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,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。1959年6月底,省档案局根据工作需要,发函调父亲到省局工

作。当时的地委秘书长做父亲的思想工作,希望他能够留下来,继续为档案事业发挥更大作用,父亲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,且一干就是20余年,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,被同行们誉为“活档案”。1982年8月,惠民地委调整充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,将已主持地区档案局工作多年的父亲调到该部门任副主任。同事们劝他到组织部门反映一下情况,毕竟在此工作了20余年,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。不然的话,也该让组织上给自己调整一下职务。父亲对大家说,为了个人的事,我从未找过组织部门。只要组织上决定了的,咱就无条件地服从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不管是在何种岗位上,父亲都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人,总有着干不完的工作,待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。那是1965年的初秋时节,父亲已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,母亲说是去外地出差了。一天,我与同院的小伙伴们徒步到乡下郊游,却意外地在一片玉米地里见到了父亲。只见他头戴斗笠,额头上淌满了汗水,正与社员们一起收割庄稼。我十分纳闷:父亲离家这么近,公家还配给他一辆自行车,怎么就不回家呢?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当时兼任原滨滨县蒲城区委副书记,平时住在宋黄村,与社员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及时准确地把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,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,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,努力改善群众生活,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为了工作,父亲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和区上两边忙,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,不回家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父亲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信访工作。为了及时化解矛盾,稳定社会秩序,父亲全力投入到信访案件处理工作中去。对于群众的来信来访,父亲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解决,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位群众的心坎上。能当场解决的,就当场解决;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,就联系相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,并加以督导和落实,让群众满意。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,得到了群众的认可,许多群众慕名找到父亲解决问题,吃饭时间、休息时间也被繁忙工作

占用去了。有的群众没钱吃饭,父亲就直接领到了家里,如同亲人一样对待。父亲认为,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,不用真心对待群众,为群众办实事,要我们干什么呢?

文革中,父亲被下放“五七”干校劳动,母亲和我、弟弟也由城里遣返原籍落户。家中无房居住,盖房期间,父亲没能请一天假帮忙,是母亲靠着亲戚和乡里乡亲盖起来的。爷爷病危时,几次电报催促,父亲也未能见上爷爷最后一面,这让父亲的心里十分内疚。可是,一开始干工作,父亲就全然不顾了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受错误思潮的影响,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情况,有的人上班不积极,工作时间忙私事、家事,父亲却不为所动。为尽早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抢回来,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由于劳累过度,积劳成疾,父亲患上了高血压、冠心病,住进了医院。结果,病还未痊愈,父亲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去。

计划经济那会儿,机关人员涨工资是按百分比分配名额,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,经大家评议确定人选。每当这时,父亲总是大家推荐的对象。然而,父亲考虑到几位家属在农村的同事,孩子多、负担重,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,让他们安心工作,父亲曾先后几次把涨工资的指标让给了他们。久而久之,父亲的工资反而比别人低了许多。对于家庭生活出现实际困难的同事,父亲除带头捐款外,还协调民政部门予以救助。每年的评先树优,父亲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奋斗的同事们;遇到分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、手表票时,父亲也是先让大家选,把自己放在后面。谈起这些事儿,那些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同志们说,像你父亲这样不摆官架子,工作干在前,吃苦走在前,不计个人得失,勤政为民,公而忘私的党员,真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。

作为党员,父亲考虑问题先从国家利益着想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母亲在北镇(现滨州市)一家国营企业上班。当填写招工表时,父亲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,影响工作,就把名额退回到了厂里,母亲从此也就没了编制,各项福利待遇全没了。为了补贴家用,母亲干

了一辈子的临时工,吃苦受累只有她心里清楚。到了晚年,母亲靠着父亲的遗属补助生活,从最初的几百元到后来的千余元。提起此事,母亲总是忘不了感谢党的关心关怀,她是带着幸福与满足离开人世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刚刚设立,急需写材料的骨干人员。得知我在报刊经常发表各类文章,且具有一定的写作经验,原滨州市(现滨城区)党史部门便准备调我到该部门工作。在征询父亲意见时,父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对我孩子工作上的认可,我很感谢,但我在地区党史部门工作,孩子在下面党史部门工作,这样做,对外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,也不利于工作。希望你们优中选优,真正把能担此重任的人才选拔出来,为做好党史工作贡献力量。”我工作调动的事,就这样被父亲给“搅黄”了,但我从没责怪过父亲。我知道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,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。

父亲在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,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十分俭朴。父亲生前仅穿过中山装、国防服,从未穿西服系领带;他长年穿布鞋,有双绿色胶鞋是劳动和雨天时穿的,他的那双皮鞋从我记事起就有了,缝了补丁仍舍不得换新的。就是这样一身装束,父亲在北京受到过中央领导人的接见,每年去省城学习和开会也从未感到异样——这是因为艰苦朴素是我党大力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党的教导铭记于心,父亲始终是坚定的践行者。

父亲生前从未过过父亲节,或许是当时生活不富裕的缘故,节日大都被人们忽视了。今年的父亲节,谨以此文献给书写人生美丽篇章的父亲,向父亲致敬!

